

# 本土化和全球化:社会心理学的现代双翼

周 晓 虹

本文从“本土化”和“全球化”这两个近来引起大陆社会心理学界高度关注的现象入手,阐明了其概念内涵及形成原因;接着,文章就本土化和全球化的关系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理论探讨。作者认为,那种以为“只要是本土的就一定能够成为全球的”的观点是片面的,较为全面的观点应该是:本土化有赖于全球化,而全球化同样有赖于成功的本土化。在此基础上,作者就中国社会心理学的本土化提出了下述五方面的看法:(1)本土化需要对西方尤其是美国社会心理学进行批判与改造,但本土化不意味着拒斥“全球化”;(2)本土化需要从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中吸取养分,但本土化不等于传统化;(3)本土化需要向先行一步的台港社会心理学借鉴经验与教训,但本土化不等于台港化;(4)本土化需要我们研究中国的社会现实,但本土化要坚决避免非学科化;(5)本土化的最终目标不是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心理学,而是参与甚而影响世界主流社会心理学的发展,使中国的社会心理学能够成为世界社会心理学知识体系的一部分。

作者:周晓虹,男,1957年生,南京大学社会心理学研究所副教授。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心理学”几乎是伴随着中国大陆社会心理学的重建而起的一句口号。尽管迄今为止,我们还不那么容易见到对“中国特色”(本土化)及其有关问题的深刻的理论阐释以及从概念、具体设计到研究手段真正具有“中国特色”或本土定向的实证研究,但应当承认,近几年来尤其自1992年6月中国社会心理学会在湖北神农架召开首届“中国人社会心理研究讨论会”以来,中国社会心理学界已经不满足于使上述口号仍流于空洞,而是真正力图使之成为踏踏实实的奋斗目标。

不过,同样应该承认,中国大陆社会心理学目前的这场本土化运动在相当程度缺乏自觉性,缺乏深厚的理论准备和必备的物质条件与技术手段,也缺乏对世界主流社会心理学的充分了解、吸收和批判。在某种程度上,这场本土化运动是由相对超前的台港地区的社会心理学引发的。换句话说,它的动力更主要的是“外源性的”,而不是内源性的。这不可避免地会造成这场学术运动的某些浮浅和偏颇。我们认为,为了保证中国社会心理学的健康稳固发展,有必要再就社会心理学的本土化尤其与全球化的关系(这常常被有意或无意地视为是一种对立的关系)作一番更加深入的探讨。

## 一、本土化和全球化辨析

论述社会心理学的本土化与全球化,首先需要就这两个核心概念作一番简单的界定。

“本土化”是一个至今为止在学术圈内尚未获得一致意见但却被广泛使用的术语。和这一术语十分接近的另外两个术语是“中国化”和“有中国特色的”。在这三个相互接近且常常为人们混用的概念中，“中国化”的历史最为长久。早在本世纪20—40年代，中国的第一代社会学家和社会心理学家，如孙本文、潘光旦、陈达、杨开道、费孝通等人，在用西方的理论和方法研究中国社会的现实时，就产生了使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的知识体系适用于中国社会即使之中国化的具体设想，他们并且为实现这一设想做出了艰苦卓绝的努力。可以说，当时提出中国化的设想，既是中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且不断接受西方文化后产生的一种独特的社会现象，又是中国知识分子不满足于被动地接受包括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知识在内的西方文化、作西方文化传声筒的一种特定的心理状态。这种设想的提出前提是对西方文化的两面性有了比较深刻的了解，即不但了解了作为西方文化产儿的现代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的科学性和普适性的一面，同样也了解了它的非科学性和特殊性的一面。单单这种设想的提出已足以说明，当时的中国确实已如M. 弗里德曼所说，成了美国和欧洲以外的“世界上最繁荣的社会学所在地。”<sup>①</sup>

“有中国特色的”是80年代后中国大陆重建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以来更常使用的一个术语。显然，这个术语的使用受到当今中国社会的政治生活的影响，因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中国进入改革开放以来最普遍也最为人们熟悉的一句口号。尽管“有中国特色的”这一术语的政治色彩较浓，但它的意义与“中国化”基本一致，即我们应该在引进与接受西方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知识体系的同时，对它加以改造并赋予其中国特色。

最后，“本土化”则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成为头号经济、政治、军事、科技大国并因此成为头号学术大国后，在除美国以外的其他工业化国家组成的第二世界和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组成的第三世界中，掀起的一种带有普遍性的学术运动。这一运动要求各国和各地区的行为与社会科学研究者，在批判与吸收外来的（主要是美国的）行为与社会科学成果的同时，从自己的社会实际和社会需要出发，针对自己要解决的现实问题，提出自己的理论设想，采用各自有效的研究方法，去揭示人类社会和人自身行为的客观真相。从某种程度上说，“本土化”是半个多世纪前“中国化”的一种扩大和延续。换言之，半个多世纪前中国知识分子的要求，现在不但成了和中国境遇相同的处在学术边缘状态的第三世界学术界的共同要求，而且也成了在战后被美国抛出学术核心圈处在半边陲状态的第二世界学术界的共同要求。<sup>②</sup>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杨中芳认为在这三个术语中选“本土化”最为合适，因为它“代表一个比较适用于任何地区的普遍、抽象概念。任何文化、国家或地区的研究都可以走向本土化的道路。”<sup>③</sup>

本土化运动的出现并成为一种世界性现象的具体原因是多方面的。单就社会心理学及与之密切相关的社会学和心理学领域而言，可以归纳成这样几个方面。

(1) 随着科学研究的深入和人类交往范围的扩大，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已经认识到，“社会及行为科学所研究的问题，所创构的理论，以及所运用的方法，常受社会与文化背景的影响……”<sup>④</sup>，因此，根本不存在什么能够超越时空具有普遍的解释力的社会及行为科学知识。要使外来的社会与行为科学知识能有效地解释本民族或本地区的社会现象和人的行为特征，就必

① 魏章玲：《社会学与美国社会》，辽宁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页。

② 参见F. M. 莫加丹：《三个世界的心理学》，《美国心理学家》1987年第10期。

③ 杨中芳、高尚仁主编：《中国人·中国心》（人格与社会篇），远流出版公司1991年版，序论第3页。

④ 杨国枢、文崇一：《〈社会及行为科学的中国化〉序言》，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1981）。

须使之首先与该民族或该地区的社会文化传统和现实需要相符合。令人欣慰的是,持这样一种看法的人并不限于以吸收外来知识为主的第二和第三世界学术界,而且也包括了美国学术界中的许多有识之士,甚至最早提出这种看法的就是从事跨文化研究的美国文化人类学家。<sup>①</sup>

(2) 肇始于70年代的现代社会心理学(美国是它的大本营)的那场危机,不但使本来踌躇满志的美国学者对传统的以实证主义、实验主义和个体主义为特征的研究范式产生了不满,<sup>②</sup>而且也使原先跟在美国学者后面亦步亦趋的第二和第三世界的学者疑虑重重,他们开始领悟到连自己的社会都不能充分说明的美国社会心理学当然不能全盘用于说明美国以外的社会。换言之,对原先深信不疑的美国社会心理学的失望,也是促使各国、各地区的社会心理学家投身本土化运动、立志发展自己的社会心理学的原因之一。

(3) 民族自尊心及由此而来的对美国的文化霸权主义的不满,同样是本土化运动在世界范围内产生的原因之一。E. 西尔斯曾提出,本土化运动的兴起部分源于处于世界学术边缘地带的知识分子由于得不到学术核心地带的重视而产生的不满。<sup>③</sup>这种相对狭隘的因素虽不是本土化运动起因的全部,但确实是其中的一部,并且对中国这样的有着悠久的文化传统的国家来说可能更为强烈。守着五千年的文化传统,却要唯只有两百年历史的美国人马首是瞻,对任何一个中国人来说都是难以心平气和地接受的事实。所以叶启政会说,“单就民族感情与自尊的立场来看,中国社会学所具有的‘移植’和‘加工’性格,就是令人难以忍受的。”<sup>④</sup>

与“本土化”相比,“全球化”更是一个值得探讨的术语。这不仅因为“全球化”和“本土化”一样缺乏严格一致的内涵,而且因为它的使用机会比后者要少得多(但在本土化运动兴起之前,它事实上被视为是不言而喻的)。今天,和这一术语十分接近的还有“世界化”或“现代化”。它们的具体含义或运用范围虽可能有不同,但都指的是使社会心理学成为能为全球或世界共用的现代知识体系。不但世界各国或各地区的社会心理学家能够在该体系内用相同的概念进行对话和交流、用彼此能够理解的方法进行研究,而且他们得出的结论也能普遍用于解释各国或各地区成员的社会心理现象。

和本土化一样,全球化也有其理论和现实依据。稍加总结,我们也可以归纳出三点。

(1) 虽然世界上不存在两个完全相同的社会,但也不存在两个完全不同的社会,并且对任何社会及生活在任何社会中的成员来说,它们(他们)的相同之处肯定要大于它们(他们)的相异之处。譬如,任何社会都有其地理环境、人口构成和生产方式等物质条件,也都有其生物及文化基础;任何社会都是由群体组成的,群体又是由个人组成的;任何个人在任何社会中生活都要经过社会化的过程,任何社会都有自己的正常行为的标准,与之不符的谓之越轨行为。这些人类社会共同的结构与特征,在一定意义上是超历史和跨文化的。况且,随着现代交通和传播媒介的日益发达、各国各民族的交往日益频繁,人类社会的这种共性还在不断增多,他们面临的社会问题也常常是共同的。这正如英国社会学家斯克莱尔所说,“全球化观念的中心特征在于:当代的许多问题都无法在民族国家的层次上,即从国际(国家间)关系的角度给予恰当的说

① 参见周晓虹:《论文化人类学对社会心理学的历史贡献》,《社会学研究》1987年第5期。

② 参见周晓虹:《现代社会心理学的危机》,《社会学研究》1993年第3期。

③ E. 西尔斯编:《知识、权力及其他》,1972年英文版。

④ 叶启政:《从中国社会学的既有性格论社会学研究中国化的方向与问题》,《国外社会学》1993年第3—4期,第48页。

明,而必须超越民族国家界限,从全球(跨国)过程的角度去加以研究。”<sup>①</sup>

(2) 虽然现在在世界学术界占主导地位的美国社会心理学在其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要受到美国社会的现实、美国人的价值观、美国人的行为准则甚至美国人的兴趣和偏好的影响,但它作为一门现代知识体系,具有起码的科学性。如果我们仅仅因为社会心理学是西方并进而是美国文化的产物就全盘否定它的合理性和科学性,那么我们要否定的就不单单是一个社会心理学,还有整个现代社会科学,甚至包括整个自然科学。长期以来,许多人都认为,只有社会科学受一国的社会文化和价值体系的影响,而自然科学却是在真空中产生的,这其实是一种莫大的误解。其实,不仅具体的社会文化环境支配着自然科学家选择他们的研究课题、影响着他们看问题的思路(了解萨丕尔-沃尔夫学说的人都知道,每种语言独一无二的设计本身就包含了一种独特的世界观。如此,欧洲语言不仅包含了谈论世界的方法,还包含了那个世界的模型)<sup>②</sup>,而且现代自然科学的产生本身也脱离不了欧洲人关注自然的社会文化传统。尽管我们承认社会科学受到的社会文化因素和价值观的影响肯定要大于自然科学(前者在研究者和研究对象两方面都受到影响,而后者只在研究者一方面受到影响),但单凭这点似乎还不能成为我们对一者完全肯定,对另一者完全否定的理由。

(3) 民族自尊心同样也是我们坚持全球化的理由之一。如果我们在进行社会心理学的本土化的同时,回避与当今世界上的主流社会心理学的交往,不肯进一步了解、吸收他人的成果,那我们不仅没有可能最终对这主流社会心理学产生影响或形成挑战,而且也没有可能最终满足我们的民族自尊心。到那时,我们虽然少了一份跟在人家身后亦步亦趋的的屈辱,但又多了一份自说自话、与他人没法对话的孤寂。因此,单提本土化不提全球化,同样是半边陲或边陲国家的学者缺乏影响世界学术走向的信心的表现。

## 二、全球的最初是本土的,但本土的最终不都是全球的

写到这里,恐怕既不会有人反对社会心理学的知识体系必须同本国或本地区的社会文化传统相适应,也不会有人反对我们从事研究的最终目的是要建立一种能够对人类行为的解释具有普适性的世界或人类社会心理学。<sup>③</sup>用一句形象的语言来说,本土化和全球化成了社会心理学展翅高飞的现代双翼。

在论证了本土化和全球化对现代社会心理学来说都是缺一不可的之后,现在我们应该接着讨论的问题是:如何理解本土化与全球化之间的关系?

在论述民族与世界即本土与全球的关系时,曾有这样一句话:“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尽管这句话流传甚广且至今仍然常常为人所引用,但我们必须指出,这句话是有错误的,起码是不全面的。因为我们都知道,虽然世界的来自民族的,但显然并不是所有民族的都能成为世界的。换句话说,世界的来自民族的并不意味着世界的就等于民族的。

一个民族的文化传统、行为规范、发明创造、学术成果、人生理想甚至日常爱好要成为世界的共同财富和共同标准,起码需要具备以下两大方面的条件。

① 斯克莱尔:《全球化社会学的基础》,《社会学研究》1994年第2期,第5页。

② 参见卡罗尔主编:《语言、思维和现实——沃尔夫论文选》,1956年英文版。

③ 参见杨国枢:《我们为什么要建立中国人的本土心理学》,《本土心理学的开展》,桂冠图书公司1993年版,第51页。

首先,这个民族当下必须处于走在世界发展的前列并能够对世界或其他民族产生影响的地位上。一个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状况,是这个民族在世界上有何种地位、何种形象及何种影响力的前提条件。15世纪以前的中国、18—19世纪的英国和进入20世纪后的美国对其周边国家及整个世界的影响,无一不是奠基于本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甚至军事实力之上的。尽管我们承认,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的文化都有其存在的价值或理由,但这个价值或理由显然不必然构成影响其他民族的文化价值和理由。如此,虽然摩天大楼和蒙古包对地价昂贵的纽约和辽阔而又多迁徙的蒙古草原说都是合理的,但在今天全球“城市化”的浪潮中,能够对其他国家或其他民族构成影响的显然是摩天大楼而不是蒙古包。

其次,能够影响其他民族的文化民族,一定是善于吸收其他民族的文化并不断扬弃自身文化的民族。并且,这个民族的文化与其他民族的文化应该是既相联系又有所超越的。以我们现在常常矛头所指的美国社会心理学为例,单从其本身的发展来看,它今天的“霸主”地位就是建立在向先前的“霸主”欧洲社会心理学学习的基础上的。尽管本世纪初的欧洲人对欧洲文化的无所不在的影响也不乏抱怨,但他们却一刻也没有停止对包括社会心理学在内的整个欧洲文化的吸收。我们所熟知的美国早期社会心理学家莱斯特·沃德、阿·斯莫尔、乔治·文森特和F·吉丁斯无一不是以积极介绍、传播欧洲社会心理学为己任的大师。熟悉社会心理学历史的人都知道,罗斯的那本《社会心理学》的主要内容,基本上都在法国人塔德的著作中出现过,<sup>①</sup>而F·奥尔波特的道路也显然是沿着德国人冯特的足迹走出的,他继承了后者的实验传统,但却将被后者排斥在外的社会变量引入了实验室,并因此赋予社会心理学以鲜明的现代(或曰美国)特征。

在论述社会心理学的全球化时,我们认为有必要划分两种不同形态的全球化。第一种形态的全球化是消极的全球化,即单纯地了解、学习、吸收在世界上占主流地位的社会心理学(今天主要是美国社会心理学)的研究成果;第二种形态的全球化则是积极的全球化,即不但要了解、学习、吸收主流社会心理学的一切长处,而且要积极参与进而影响世界主流社会心理学的发展和走向。用一句形象的语言来表述,消极的全球化仅仅立足于使世界的(或暂时作为世界之代表的)成为我们的;而积极的全球化则同时也立足于使我们的能够成为世界的。

尽管我们将划分出的两种形态的全球化分别称之为积极的与消极的,但应该指出的是,对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的社会心理学的发展来说,这两种形态的全球化都是必须的。从一般的顺序上说,消极的全球化在前,积极的全球化在后,在这两者之间就是本土化时期。(自然,这种顺序是相对的。决不意味着一者全部实现,另一者方能开始)这一顺序其实已经表明了全球化和本土化的关系,用一句话来表述就是:本土化有赖于(消极的)全球化,而(积极的)全球化同样有赖于成功的本土化。

这样的表述决不是玩弄语言游戏。说本土化有赖于(消极的)全球化,是指不但本土化的提出本身就是对外来的主流社会心理学充分了解、学习和吸收的结果,而且这种了解、学习和吸收的广度和深度也直接决定了本土化可能推进的程度;而说(积极的)全球化有赖于本土化,则是指社会心理学的知识体系只有同本国或本地区的社会文化传统相结合,才能产生真正具有民族特色的研究成果,并因其独特性而获得国际社会的关注和承认,成为现代社会心理学知识体系的一部分。在这一问题上,大陆和台港地区社会心理学的本土化运动及其差异,是一个具

<sup>①</sup> 周晓虹:《现代社会心理学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89页。

有说服力的例证。

台港地区尤其是台湾地区的社会心理学的本土化运动,是在“移植”西方主要是美国社会心理学 30 年之后出现的。用黄光国的话来说,这 30 年里台湾地区的社会心理学经历了草创、奠基、成长三大时期,而本土化运动则出现于 1980 年起的反省时期。<sup>①</sup>可以说,前三个时期是反省的前提,更是本土化的开展前提。在这前 30 年中,台湾地区的社会心理学家通过留学海外(主要是美国),对现代社会心理学的发展、现状和经验教训有了非常充分的了解,并有可能领悟连自己的社会都不能充分说明的西方社会心理学当然不能全盘用于说明中国社会;加之在本土和海外两地生活过的“边际人”身份,也使他们能够切实比较中国人与西方人的社会行为模式,并发现两者间的巨大差异。正是这一切,使得他们的本土化运动并不全是由带有情绪性的民族感情所促成,而且也包括理性反省的成份,其动力主要是内源性的。这使得台港地区的社会心理学的本土化运动在 80 年代后能够相对扎实地开展起来,并初步产生了一些有国际影响的研究成果。

相比之下,大陆学者的不足是显而易见的。由于闭关锁国(80 年代以前)、资料和经费匮乏、研究手段落后以及专业人员素质不高等原因,大陆社会心理学家与当代主流社会心理学缺乏充分与必要的接触。许多人不了解以美国为代表的现代社会心理学在 70 年代遭遇的那场危机及其后果,也不清楚美国以外的国家对这场危机的具体反映。由于不甚了解现代西方主要是美国社会心理学的局限性(如实证主义、实验主义、个体主义以及西方中心主义和男权主义),使得大陆社会心理学家往往不知从何处入手切实改造美国社会心理学并建构自己的本土化的知识体系。并且由于民族情感等原因,常常有意或无意地将社会心理学的本土化和全球化对立起来。在强调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心理学的同时,忽视甚至排斥对西方现代社会心理学的深入借鉴和学习。这样做的结果,既造成了大陆社会心理学的本土化运动无法具体实施,依旧停留在表面;也造成了其与世界性的主流社会心理学的脱节。这种脱节使其远远落后于社会心理学的当代发展,根本无法参与该学科的全球性合作,最终也难以真正改变自己在世界社会心理学中的非主流或曰边缘地位。

造成大陆社会心理学的本土化运动仓促上马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台港社会心理学家的外在推动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早在 1987 年,即大陆社会心理学重建不久的“萌芽”阶段,最先与大陆同行进行交往的香港社会心理学家杨中芳博士就从台港地区主要是台湾地区近 40 年的经验教训入手,告诫大陆同行:“社会心理学既然是研究人的社会行为的,它就不可能脱离它所研究的对象所生存的社会。这样,要研究中国人的社会心理,就必须在中国社会范畴中,依循它自己的文化及历史背景来选择它的研究题目及研究方向。”<sup>②</sup>作者希望大陆社会心理学能从头开始,脚踏实地地对中国人自己的社会行为作本土的考察和描述,并进一步创造出可以涵盖中国人行为的理论架构,设计出真正适合于中国人的研究工具,从而建立起属于自己的社会心理学。这样的看法应该说是十分深刻的,并且也确实对大陆学者的研究起了良好的指导作用。但问题在于,作者由此对年轻得近乎幼稚的大陆社会心理学指出的发展方向却过于沉重或曰超前。大陆社会心理学界今天无论从人员素质、学科发展的规模,还是从物质条件、技术手段上说,都暂时不具备全面而成功地实现社会心理学的本土化的基础。从这样的考虑上说,

<sup>①</sup> 黄光国:《四十年来台湾心理学的发展》,《中国论坛》(台北)1985 年总 21 卷,卷 2 期。

<sup>②</sup> 杨中芳:《试谈大陆社会心理学研究的发展方向》,《社会学研究》1987 年第 4 期,第 63 页。

这些年来台港学者关于发展大陆社会心理学的建议与论述,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不自觉地台港地区社会心理学目前所遇的问题当成大陆学界的当然问题的倾向。他们在积极推动大陆社会心理学的本土化的同时,多少有些忘却了本土化本身也需要“本土化”,即需要与大陆目前的社会现实和社会心理学的发展状况相适应。

### 三、走出本土化的认识与研究误区

当然,我们这样说并不意味着大陆社会心理学目前不需要本土化,也不是说要让这本土化停下来,先完全实现(消极的)全球化再进行本土化。我们只是想说,大陆今天的社会心理学决不能为了推进本土化而忽视甚至排斥(消极的)全球化。否则,我们不仅会离现代社会心理学的主流发展越来越远,而且我们的本土化最终也将因为缺乏后劲、缺乏内在动力而半途而废。

为了使大陆社会心理学的本土化获得健康稳固的发展,我们认为大陆学者首先要在下述问题上取得比较一致的认识。

第一,本土化需要对西方尤其是美国社会心理学进行批判与改造,但本土化并不意味着拒斥“全球化”,也不意味着“重起炉灶”。

西方尤其是美国社会心理学本身的弊端及其全盘用于解释中国社会的不合理性,在最近几年大陆学界的讨论中已有比较充分的论述,其中的理由现已被认为是不言而喻的;但问题是,我们在进行本土化时是否有必要将其全盘抛弃,再去建构一个完全不同于西方的以中国为本的社会心理学理论体系?

认为应该从根本上重新建构中国社会心理学的想法在学界已经出现。无论台港地区或是大陆都认为,中国社会心理学的本土化应该划分为这样四个层次:(1)重复、验证或借用西方社会心理学成果;(2)用西方的方法和理论来发现中国人的心理和行为;(3)用自己的方法、概念来研究中国人;(4)建立完整解释中国人社会心理的理论体系,包括对象、概念、方法和理论。<sup>①</sup>这种观点虽没直接说要“重起炉灶”,但其关于第三和第四两个层次的设想,确实让人感到有要在包括对象、概念、方法和理论的方方面面“重起炉灶”的倾向。

我们知道,这一主张是从杨国枢先生那里发展而来的,但杨国枢的后两个层次原分别为:修改或创立概念理论,改良旧方法与设计新方法。<sup>②</sup>在这里,我们仍然能够清楚地看到,经“本土化”后建立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心理学与西方社会心理学仍具有十分密切的联系。换句话说,这种本土化是由西方社会心理学“化入”的,而“化出”后也并非就与西方社会心理学全然不同。我们赞同这种“本土化”的观点,因为它既说明了我们要将外来的变成本土的,是因为外来的不适应本土的一面;同时它也说明了我们所以能将外来的作为创立本土的模型,是因为外来的同时又有适应本土的一面。

第二,本土化需要从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中吸取养分,但本土化不等于传统化。

我们中华民族有五千年的文化传统,这种独特而历史悠久的文化传统过去确实塑造了中国人与众不同的某些心理与行为表现。梁启超在《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三大势》中,曾将中国人的心理特征概括为:崇实际、主力行、贵人事、明政法、重阶级、重经验、喜保守、主勉强、畏天命、言

<sup>①</sup> 参见翟学伟:《论社会心理学中国化的方向》,《社会心理研究》1993年第2期,第9页。

<sup>②</sup> 参见杨国枢:《心理学研究的中国化:层次与方向》,《中国人的蜕变》,桂冠图书公司1989年版。

排外、贵自强;许烺光认为,同以个人为中心的美国人相比,中国人是以自己在同伴中的恰当地位及行为的情境为中心的,对家族的重视是中国人的性格特征;<sup>①</sup>近来台港和大陆的一些社会心理学家还提出,诸如缘份、报、耻、义、礼、人情、孝道、脸与面子等,都是中国人特有的社会心理现象。无论这些判断是否正确,这些社会心理现象都与传统文化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则是没有什么疑问的。

中国社会心理学的本土化当然可以也应该关注上述传统的社会心理现象,但这绝不意味着将这些传统的社会心理现象作为中国社会心理学唯一的或主要的研究对象。如果说人们的社会心理受制于人们生活其间的社会文化环境的话,那么,能够肯定中国的传统文化决不是影响或制约现代中国人的唯一的社会因素。单就大陆而言,显然今天的中国民族文化已经超越了通常意义上的时空界限,是包容了外来文化、现代文化和传统文化的冲突与融合、对立与扬弃关系的民族现态文化。这一民族现态文化既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也受到外来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同样还受到现代西方文化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认为本土化就是要重新向传统复归、从传统文化中寻找建构中国社会心理学的全部质料的话,同样是脱离中国现时社会实际的一种表现。比如,在许烺光的论述中,家族是传统中国社会中影响人的行为及其选择的最重要的社会因素。但现时代的中国家庭尤其城市里的家庭,虽然聚合力仍较西方为强,但核心化、易于解体的现代趋势也日益显著,古老而庞大的家族体系已少有存在。此时,如果我们还从传统中国的家庭或家庭特征出发,去研究其对中国人的心理行为的影响,自然就无法把握中国人真实的社会心理与行为特征。家庭是这样,其他方方面面又何尝不是这样呢?在今天的大陆中国,自1978年起的改革开放在使中国社会发生迅猛的变迁的同时,也使中国人的社会心理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嬗变。我们认为,研究现实的社会心理学及其嬗变应成为中国大陆社会心理学家的主要任务。

第三,本土化需向先行一步的台港社会心理学借鉴经验教训,但本土化不等于台港化。

大陆社会心理学起步晚、基础薄弱,在大陆社会心理学的重建过程中,先行一步的台港社会心理学无疑能给我们许多帮助和启发。事实也是这样。1984年,当大陆社会心理学刚刚起步之际,从美国去香港不久的杨中芳博士就首先进入大陆,在南开大学和北京大学为大陆第一届社会心理学研究生授课,并在其后的几年里在大连、广州等地自费为大陆学生举办了数期社会心理学讲习班;1990年,台湾大学教授杨国枢回大陆参加了中国社会心理学第四次学术年会,并从第二年起组织台湾地区十数位社会心理学家赴大陆与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社会心理学会合作,一连数年举办了高规格的暑期研讨班。这种帮助对年轻的大陆社会心理学来说是必须的,台港学者的学识与人品也给大陆同行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但是,大陆与台港地区毕竟分割了40年,它们在政治制度、社会背景、文化传统以及当今所面临的现实问题上多有不同,这种不同也使大陆与台港人民的社会心理不尽相似。此外,大陆与台港地区学者所受的教育、专业训练、知识背景、学术旨趣、个人理想以及可以支配的物质资源也不完全一样,这使他们当下所考虑的问题以及分析和解决这些问题的方式不会没有差别。说透彻些,“一个社会的心理学者所研究的问题,常是这个社会当时的生活需要、社会哲学或时代精神的函数”<sup>②</sup>。如此,如果我们在实现中国社会心理学的本土化的过程中,完全按台港社会心理学的模式去选择课题、

① 参见许烺光:《美国人与中国人:两种生活方式比较》,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

② 杨国枢:《心理学研究的中国化:层次与方向》,《中国人的蜕变》,第459页。



套搬概念、使用方法、诠释理论,或干脆成为台港社会心理学的“实验地”、“组装厂”,那我们的社会心理学在中国大陆依旧不会有生命力。

第四,本土化需要我们研究中国的社会现实,但本土化要坚决避免非学科化。

促使我们进行社会心理学(社会学也是这样)本土化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是,外来的社会心理学与中国的社会现实相去甚远,不能很好地解释及解决中国社会的现实问题。这一原因在促进我们进行本土化的尝试的同时,会非常自然地使我们将本土化单纯地等同于研究中国社会的具体问题。这种倾向虽然对社会心理学的社会功能给予了充分的估价,表明社会心理学应该也能够对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但这种观点过分鲜明的实用倾向忽视了社会心理学理论及其方法的重要意义,最终有可能导致削弱甚至扼杀社会心理学这一学科的学术生命。在大陆社会心理学10余年的重建历史中,我们已经看到,由于有些研究者过分夸张社会心理学的应用价值、急于对社会现实作浮光掠影式的解释、忙于对社会问题开“一剂就灵”的处方,已经使大陆社会心理学表现出了肤浅、琐碎、非学科化甚至庸俗化的苗头。与我们很少有人脚踏实地地从事社会心理学的理论、历史、方法及具有本土倾向的“扎根式”研究相比,我们的一窝蜂似的培训班、大同小异的教科书、不痛不痒的调查报告、越来越火的心理咨询以及各种名目的“××社会心理学”却太多了。过不了多少时间我们将会发现,这种不重视理论的建构和方法的完善的非学科化苗头,一方面将使我们更加无力解释及解决中国社会的现实问题,另一方面还会由于我们的无力,最终导致大众对社会心理学的科学性和应用性发生怀疑。到那时,急于对中国社会现实作速战速决式的解决的社会心理学,反过来倒有可能被中国的社会现实所抛弃。

第五,本土化的最终目标不是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心理学,而是参与甚而影响世界主流社会心理学的发展,使中国的社会心理学能够成为世界社会心理学知识体系的一部分。

在有关社会心理学的本土化的讨论中,无论大陆或是台港学者中都有人认为,本土化的最终目标就是要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心理学。我们认为,这种观点仍然是对本土化和全球化的关系处理不当的表现。确实,我们推进社会心理学的本土化运动是为了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心理学,使社会心理学这一外来的学科能够在中国社会扎根、具有鲜明的民族性格。但是,从更为长远的角度说,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心理学只是我们推进本土化的阶段性目标,而不是最终目标。从认识论的角度说,世界上各个国家或民族先后建立起具有自己特色的社会心理学,只是分别完成了对人的心理与行为个别性和特殊性的认识,但要将这个个别性和特殊性上升到一般性和普遍性,就需要对不同国家和民族的本土社会心理学进行进一步的加工与整合,从中发展出具有普适性的堪称世界或人类的社会心理学。这个世界或人类社会心理学的构成,不会象议会分配席位那样完全按照一国或一地的人数多寡来分配比例,相反,它取决于一个国家或民族的社会心理学在世界主流社会心理学的发展中所起的作用和发生的影响,取决于一个国家或民族的本土社会心理学除了能够解释本国或本民族的特殊的社会心理现象之外,还能在何种程度上解释人类的共同社会心理现象。而后者才是一个有自信心、有前途、有望真正立足世界民族之林的中国的社会心理学应该为之奋斗的最终目标。

责任编辑:唐 军